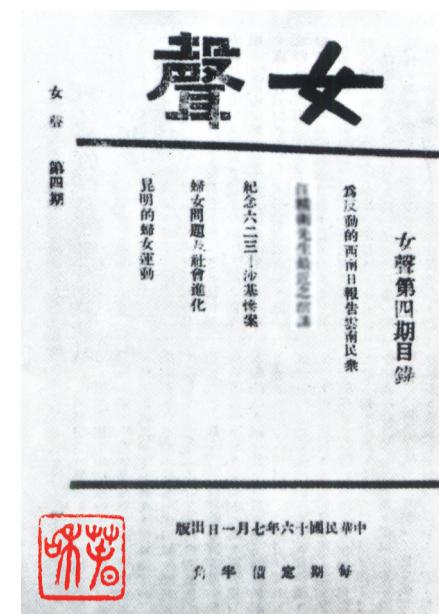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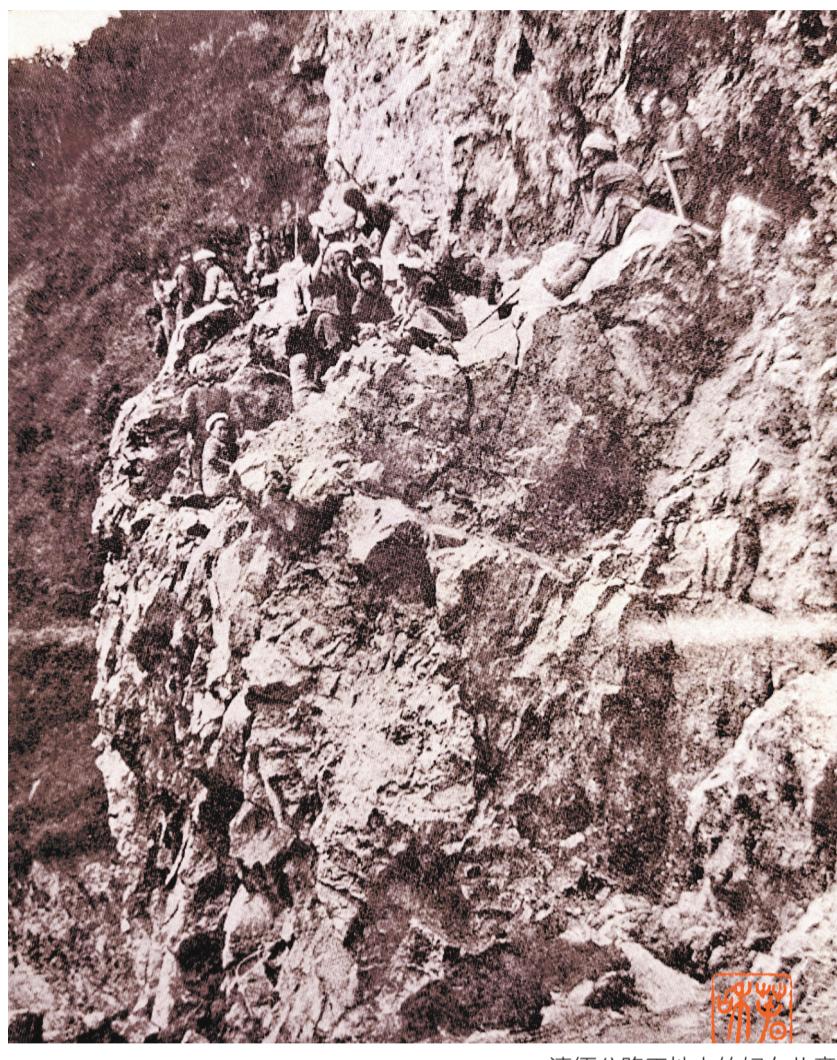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 云南妇女的卓越贡献

白婧



昆华女中学生在昆明海晏村演出话剧《上前线》后合影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思想，也是衡量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进步的理论尺度，至今仍然放射着思想光辉。从古到今，都有一些中国妇女同男子一样，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不屈不挠，舍生忘死。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制度，为妇女解放提供了新的社会条件。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开创了我国妇女运动的一个崭新阶段。这一时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也非常关心和重视妇女解放。1922年1月18日，李大钊发表《现代女权运动》一文写道：“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解放时代，亦是妇女解放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始终重视和大力推进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192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第一份妇女刊物《妇女声》，在第一期刊登王剑虹《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主张妇女运动中心应移到无产阶级方向。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邓颖超成立北京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在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格局。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爱国妇女也不再局限于躲在男子背后，眼睁睁看着日本侵略者杀我国民，夺我国土，而是整装待发，参加抗战，投身革命，奔赴前线，救亡救国，以奋不顾身的热情和无惧无畏的勇气，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战争中云南妇女 革命意识的觉醒

云南妇女革命意识的觉醒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运动息息相关。辛亥革命爆发，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开始逐渐被社会认可和接受，颁发废除裹足等法令使妇女的身心都得到解放。1911年云南“重九起义”中，明确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提倡在社会风俗等方面进行革新。这促使广大云南妇女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不断追求思想解放和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爆发，云南大批青年女子四处演讲游行，筹钱筹物，推动了妇女运动日渐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妇女杂志刊登了《非常时期妇女应有之准备》《妇女运动与民族复兴》等宣传妇女解放的特辑，唤醒妇女的民族精神和解放意识，号召广大爱国妇女积极走出家门，救治伤员，保家卫国。

抗日战争中，有10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入云南，其中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的学生中，云南本地学生只有5%，其余95%来自全国其他省市。大范围的人员内迁也带来了很多进步的理念和新的习俗，对广大云南妇女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和文化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云南省妇女会开设了战

时民众学校“妇女班”，引导学员们学习《大众哲学》等重要哲学和抗战书籍，了解抗战局势，增强必胜信念。通过开展这些妇女教育活动和妇女工作，深刻影响了云南妇女的思想意识，推动了新一轮的妇女解放，广大妇女越来越重视文化水平的提升，能够识字读书明理的人越来越多，云南妇女体现了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并且逐渐自觉地把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紧密连接在一起。

抗日战争中云南妇女 革命运动的贡献

长期以来，云南大部分地区的妇女社会地位一直十分低下。1937年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满腔热血，充满报国之志的云南妇女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抗战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

成立云南战地服务团。1937年10月5日，滇军60军在昆明誓师北上抗日，昆明女学生在抗敌后援会的支持和领导下发动请愿游行，40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来到省政府，要求上战场。

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称赞这些女学生是新时代的花木兰，并支持她们组建云南战地服务团积极配合全面抗战。这些女学生经过报名筛选和统一体检，组成了60人的“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随即自愿、自费到昆明西山华亭寺进行集训后随军抗日。1937年12月13日，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成员再次相聚并拍照留念。一位抗战老将军十分感慨，在照片上题词：“为国许身学木兰，随军转战余有余。安危早置乾坤外，孰料携手明月还。”

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奋勇争先，一心救国，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外国记者专门撰文记录了服务团的英勇事迹，该文曾被收录进英国自修大学课本，以鼓舞整个西欧的女性奋起抗争，共同抵抗德国法西斯。不仅如此，外国记者还拍摄了反映服务团接受军事和救护训练，以及服务团文艺演出和宣传表演的纪录片，在英国广泛放映，产生很大影响。云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民族陷入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响应抗战号召，卸下红妆换武装，谱写了一曲轰轰烈烈的抗日赞歌，为中国抗日战争最终取得全面胜利作出贡献。

1939年7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假如中国没有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有非常大的作用”“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国妇女也积极加入到这场革命斗争中，在战地服务、后方支援和救助老弱等工作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还有不少妇女直接拿起枪，奋斗牺牲在抗日疆场。这是中国妇女追求思想解放和权利诉求的实践表达，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各行各业，参与国家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经过这场残酷战争的洗礼，广大妇女性格柔软的天性和经历战争后的刚强坚毅勇敢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文化基因，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心同德，顽强拼搏。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

清风起云岭 美名传千古

云南古代清官廉吏

尹壮图：刚直不阿 百年树人

柴亚星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阁学街有一处清代院落，坐西向东，现存三院正房和书房等建筑40余间，这是清代云南著名官员尹壮图的故居。故居外砖瓦斑驳，见证了朝代的兴衰和一代好官尹壮图的宦海浮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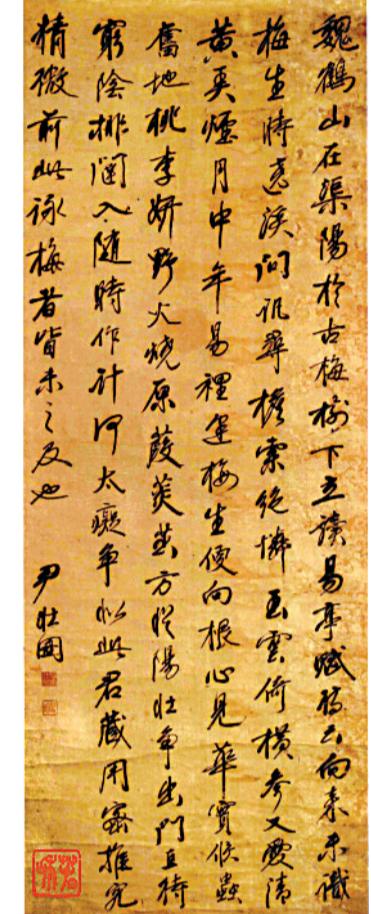
尹壮图（1738~1808年），字万起，一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中进士，改庶吉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皇帝对尹壮图有知遇之恩，曾对他说：本朝很少任用云南人为大臣，我看你品学兼优，就破格擢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以参奏天下仓库亏缺，被刑部“比挟许欺公，妄生异议律”关进大狱，判处斩刑。后来，乾隆以“不轻易以嫌为疑，不值加以重罪也”免去了他的死罪，被贬为内阁侍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月，尹壮图辞官回到家乡蒙自，受临安知府的聘请，主讲建水的郡城书院。此地现存有尹壮图亲撰的一副楹联：“朝廷立法无私，使者自正其心术；圣贤去人不远，诸生莫负此冠裳。”不负苍天社稷百姓，这也正是尹壮图自身的写照。

嘉庆二年（1797年），尹壮图前往阿迷（今开远市）的灵泉书院讲学。灵泉书院屡屡学术不兴，尹壮图在书院期间，重振兴学之风。嘉庆四年（1799年），尹壮图重回蒙自主讲崇文书院，曾撰对联：“性道发为文章，瞻儒服儒冠，矩范敢忘私淑艾；经济根乎学问，溯宋南宋北，辨香窃取薪薪。”嘉庆五年（1800年），尹壮图任昆明五华书院山长。他在五华书院讲课期间，听众有四五百人，书院都很难容得下，可见授课的精彩。他主讲五华书院期间，中举的学生有40多人，为云南培养了一批人才。

嘉庆八年（1803年），尹壮图返回蒙自的观澜书院任主讲。尹壮图本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又兼之文学造诣、书法功底深厚，所以教书自是得心应手。他知道书法是修身养性的技艺，所以在教学中格外重视，让书院的学子“每日必到书院课读，一瞬则作书”。那时，尹壮图已经是风烛残年的古稀老人，仍然收集学生的习作200余篇，不辞辛苦，一批批改，写明修改意见。在他的点拨下，很多弟子考中秀才。他教授不辍，即使生病依然坚持授课，开创蒙自一代文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为蒙自的后续发展培养了不少人才。

尹壮图诗词和书法造诣皆深，著有《楚珍自记年谱》《楚珍诗稿》《楚珍文稿》等。他晚年所撰《楚珍自记年谱》是记录他一生履历的重要材料，同时反映了清代乾嘉时期的官场情况。他在序言说明了编撰这部年谱，是为了让子孙从童年就开始养成良好的习惯，掌握读书的门径：“余所以为此谱，正欲使子孙知下入手从入之门，先端器识以立定脚跟，而器识之克端，全仗童蒙时养之以正厥，后一步有一步境界，一年有一年学力。循途守辙，庶可勉为乡里善人，至功名显晦，听诸时命而已。”

在清代历史上，尹壮图未如刘墉、纪晓岚等声名显赫，但他却是为数不多敢于和珅叫板的刚直之人。如这部年谱所言，他的一生始终称得上“乡里善人”，这个“乡里”不仅仅是指家乡蒙自，也是指云南。尹壮图曾随乾隆南巡扬州，代乾隆为史可法墓上香，留下“不朽非关一片骨，梅花时助返魂香”诗句，这大概也是尹壮图一生的追求和写照吧。

蒙自南湖公园内的尹壮图雕像
耿嘉摄

尹壮图手迹

在清代历史上，尹壮图未如刘墉、纪晓岚等声名显赫，但他却是为数不多敢于和珅叫板的刚直之人。如这部年谱所言，他的一生始终称得上“乡里善人”，这个“乡里”不仅仅是指家乡蒙自，也是指云南。尹壮图曾随乾隆南巡扬州，代乾隆为史可法墓上香，留下“不朽非关一片骨，梅花时助返魂香”诗句，这大概也是尹壮图一生的追求和写照吧。

（作者单位：昆明航空有限公司）

王禹甸：造福百姓 流芳百世

林娜娜



昭通清官亭公园

王禹甸是清代陕西三原举人，关于他的生平史料记载不多，但他自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就任恩安县令（今昭通市）县令一年多的事迹，一直被当地百姓传颂到今天。

攻坚克难，心怀百姓。嘉庆十三年（1808年），王禹甸出任恩安县令。由于“锁钥南滇，咽喉西蜀”的特殊地理位置，恩安县成为滇川黔三省要冲，又处于鼎盛一时的朱提银矿山腹地位置，当时已是一座工商繁华的城市。史料记载：

“在昔昭城，商业繁盛，务发达，称银用秤。滇铜蜀盐，车马交驰。秦楚赣粤，工贾群进。苏松棉布，填塞路径。百货云集，任人贩运。”另有史料载：“乾嘉年间，落（乐）马厂、长发洞、金沙厂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即以一车饼（未经精炼的银饼）运回。”但令人费解的是，在这座人口数万的恩安县城中，

仅有两个从北郊十里之外大龙洞引水而来的小水塘供居民生活之用，遇到大旱少雨或春耕农忙之时，城内用水告急，百姓叫苦连天。王禹甸上任后，面对恩安县百姓用水困难的问题，没有像他的前任一样置之不理，而是在走访了解详细情况之后，带头捐资并倡导当地乡绅和商人集资，兴建新的储水池。储水池主体修建竣工后，王禹甸为它取名“三多塘”。“三多”出自《玉海》：“看多、做多、商量多也。”这不仅是王禹甸的自励自勉，也是劝喻世人。

前后相续，共促发展。王禹甸任职恩安县令一年有余，在“三多塘”主体竣工后，即卸任离去。他的继任者欧阳道瀛在“三多塘”工程全部完工后，留下了一篇记述王禹甸事迹的碑记：“城之有池不徒为御旱计也，而晨夕饮烹养生之政以昭。郡邑荒芜旧址，背山为城，距大河

十数里，关以内无井泉，惟涓涓之龙洞由沟入城，停蓄于大小两池。每无雨则涸且秽，军民病之。即官斯土者，企谓形势所限，无长策焉。迄嘉庆戊辰，奕山王公来篆恩邑，初下车，拊民疾苦，著以修龙洞为请。公曰：‘水由洞出，天造地成，无所庸其导浚，宜更于北城外，择地浚深池，余则潴，溢则泄，既以便廓外之携注，又足济城中之挹注。’令甫下，民争赴之。阅五月而池成，既乃建庙以祀龙神，前列船房，左立仙阁，池中砌石架为歇台。费不下数千金，皆公与士庶所筹而乐输焉。事将竣而公适解篆，局余终完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王禹甸任之后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夏，“三多塘”更名为“清官亭”。当年大旱，恩安县县城原有的两个小水塘无法从大龙洞引水入城，幸好有王禹甸主持修建的“三多塘”，才让恩安县百姓免去了无水可用之苦。清官亭从建成至今跨越两个世纪，承载了当地百姓对王禹甸的感恩与怀念。清咸丰五年（1855年）乙卯举人饶江，为清官亭撰写楹联：“者点水无多，一官已留青白去；此间尘不染，何人更踏软红来。”这副对联是对王禹甸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流芳百世的最佳注脚。

“正气如旭日耀空，耀古耀今，始终浩然正派；清官似荷塘流水，流来流去，先后勤慎清廉。”任官一方，不管职位高低、任职长短，都要对当地做出贡献，像“清官亭”的建造者王禹甸、继任者欧阳道瀛一样，成为流芳百世的清官。

（作者单位：云南农业大学）

云南省纪检监察学会
云南日报 联办
云南廉政研究中心



本版主编：云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投稿邮箱：ynrb-lb@yndaily.com yn001@139.com
联系电话：0871-64162931 64195021 阅读理论文章请扫码进入云南理论网